

苏州文博论丛

2010年（总第1辑）

Suzhou Archeology and Museology Review 2010

苏州博物馆 编



- 考古学上的吴文化
- 三论西周方座簋
- 唐青花初议
- 苏州博物馆馆藏谢家福档案选辑校释（三）
- 从现代博物馆理论与实践进步谈中国民办博物馆的发展

苏州文博论丛

2010 年（总第 1 辑）

苏州博物馆 编

文物出版社

责任编辑：窦旭耀

封面设计：夏 骏

责任印制：张 丽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苏州文博论丛. 2010 年: 总第 1 辑 / 苏州博物馆编. —北京:
文物出版社, 2010. 12

ISBN 978-7-5010-3126-9

I. ①苏… II. ①苏… III. ①文物工作—苏州市—文集
②博物馆事业—苏州市—文集 IV. ①G269. 275. 33-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0) 第 250100 号

苏 州 文 博 论 丛

2010 年 (总第 1 辑)

苏州博物馆 编

文物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东直门内北小街2号楼)

http: // www. wenwu. com

E - mail: web@wenwu. com

北京君升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880×1230 1/16 印张:15.75

2010 年 12 月第 1 版 2010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ISBN978-7-5010-3126-9 定价:96 元

《苏州文博论丛》编辑委员会

主 编：张 欣

副主编：陈瑞近 茅 艳 徐亦鹏

程 义 魏保信

编 辑：朱春阳 夏 骏 谢晓婷

程 义 漆跃文

卷首语

《苏州文博论丛》由文物出版社正式公开出版了，这是一件值得欣喜的事情。从创刊、停刊到复刊，再到今天的正式出版，历经风风雨雨的《苏州文博》，又将迎来崭新的一页。

上世纪80年代，为了全面及时地反映苏州博物馆群体的工作动态，苏州博物馆创办了内部不定期刊物《苏州博物馆通讯》。1992年，正式更名为《苏州文博》，面向苏州的文博工作者，每年定期发行四期，常设有吴文化研究、文物与考古、精品鉴赏、博物馆学研究、工作交流、动态简讯等栏目，是集工作动态与学术研究为一体的综合性期刊。上世纪末，已出版39期的《苏州文博》因故停刊。

2007年苏州博物馆新馆周年之际，停刊近十年的《苏州文博》复刊了，实乃是苏州文博界的一大幸事。复刊后的《苏州文博》由苏州博物馆和苏州市博物馆协会主办，内部刊号，半年刊，设有吴文化研究、考古与文物研究、遗产保护、古籍整理、藏品鉴赏、文博随笔、姑苏文史等相关栏目，既反映考古文博工作的新发现和新成果，传播文史知识，也关注学术热点，展开学术讨论，成为集资料性、知识性和

学术性为一体的文博期刊。《苏州文博》的复刊，有力地促进了专业队伍素质的提高，提升了文博学术研究的水平，推动了苏州文博事业的发展。2008年，苏州博物馆成立编辑出版部，专门负责学术刊物的编辑出版工作。至2009年编辑出版了5期，至此《苏州文博》出版发行了44期，在文博界取得了较好的反响。

为进一步提高《苏州文博》的学术性、质量和在业内的影响，加强学术交流，经过一年多的酝酿和准备，今年《苏州文博》与文物出版社合作，更名为《苏州文博论丛》（总第1辑），正式对外出版。《苏州文博论丛》暂定为一年一册，常设的栏目有：吴文化研究、考古发现与研究、遗产研究与保护、历史学、古籍整理、史料研究、博物馆学等，旨在突出吴文化地域特色，全面反映苏州文博界学术动态，以博物馆学、考古学、历史学为重点，同时兼顾其他地区和相关学科的研究。

站在新的历史起点，《苏州文博论丛》将面临更大的挑战，承担更多的责任。我们将不辱使命，勤奋工作，努力把《苏州文博论丛》办成在业内有影响、有特点的学术出版物，为文博事业的发展竭尽绵薄之力。

苏州博物馆学术委员会
二〇一〇年十二月

目 录

卷首语

1

考古发现与研究

考古学上的吴文化

李伯谦 1

苏州史前文化概述

丁金龙 5

农业起源与新旧石器时代的过渡性特征——论环境失调是农业起源的根本动力

刘宝山 9

良渚文化衰亡之我见

臧 振 17

草鞋山遗址崧泽文化墓地的发现及 M16 出土“碟形器”功能探讨

孙明利 26

金城遗址在第三次文物普查中的考古调查收获

王 霞 31

长江下游宋代墓葬综述

沈如春 38

陕西彬县东关村明代石室壁画墓的发掘

刘卫鹏 46

南京明代通济门瓮城遗址的历次考古发掘与认识

骆 鹏 53

文物研究与保护

饮食之下的青铜器

张 翀 59

三论西周方座簋

张懋镕 66

连云港双龙汉墓汉尺考

马振林 70

邳州东汉缪宇墓出土铜像辨析

沈利华 74

唐青花初议

陆明华 77

自辟蹊径 开拓创新——扬州八怪艺术成就综述

蔡云峰 82

胡开文民国纪念墨人物考

何 玮 86

简论出土古代饱水木质文物保存状况检测方法

王晓琪 90

历史研究与文献

从苏州户口变化看唐代太湖东部地区经济发展的轨迹

刘 丽 95

东吴大学堂最早的历史留言——《雁来红》

诸家瑜 102

苏州古民居堂号考

徐苏君 108

柳亚子与《分湖旧隐图》

李海珉 114

从忠王府九幅壁画探析李秀成思想的二元性

朱春阳 121

定山寺相关史料简析

王 宏 126

唐宣宗对佛教的限制及原因探析

王伟歌 张剑光 131

读《资治通鉴》札记——唐代文散官的级数

张 洁 137

陆逊和孙权关系简论

李艳涛 140

谢家福档案研究

苏州博物馆馆藏谢家福档案选辑校释（三）——熊其英（等）致谢家福（等）函稿

徐刚城 顾 霞 147

苏州博物馆藏稿本《李金镛行状》校释

吕 健 156

王韬对中日甲午战争的看法——读苏州博物馆藏《王韬致谢家福函稿》

谢晓婷 160

石刻文献研究

韩国百济武宁王陵出土墓志略论

邵 磊 164

宋胡献卿墓志考释

程 义 173

明《太医院医士李思讷墓志铭》考释

严建蔚 姚晨辰 178

明《戚畹赵君伯容墓志铭》考释

龚巨平 183

翁黹考——一字之差引起的思考

陆雪梅 187

南京溧水明武煦夫妇墓志

陈钦龙 张九文 191

《清故处士金君墓志铭》考释

姚晨辰 195

清刘讷庵墓志铭考释

许 平 199

太平天国时期高淳境内战事述略——对高淳新发现晚清石碑的考证

葛鹏云 孔令琦 206

绍兴二十五年砖跋

王光明 210

对《赵和造像记》的几点认识——康有为《广艺舟双楫》一则勘误

金迪 李 红 212

博物馆学研究

从现代博物馆理论与实践进步谈中国民办博物馆的发展

王 彬 217

博物馆在和谐社会的建设中是可以大有作为的——苏州工艺美术博物馆工作实践所思所想

马建庭 222

革命纪念馆网络化建设初探

张 昊 225

十日不同天——谈“择厥吉金 自制御器——吴国王室青铜器特展”展览设计

杨 艺 江伟达 230

世博中国馆动画版《清明上河图》的启示——兼谈苏州博物馆陈列展览中展示手段的运用

夏 骏 235

浅析博物馆在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中面临的困境及对策

高 强 239

考古学上的吴文化*

李伯谦（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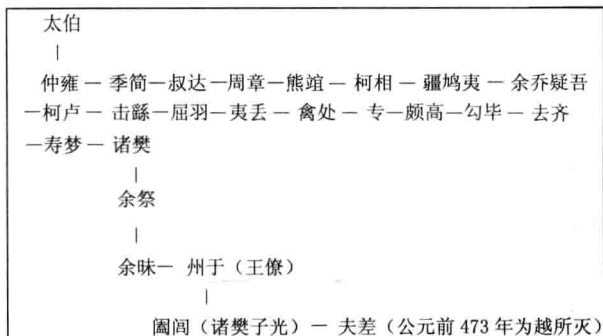
今天一走进苏州博物馆，就感到苏州市民对自己乡土文化有浓厚的兴趣，我非常高兴。今天是中国文化遗产日，馆里邀请我做个讲座，我选了“考古学上的吴文化”这个题目，之所以选这个题目是因为我和你们一样对它有兴趣。一九八三年秋天在苏州开吴文化讨论会，我参加了。从那时开始到现在二十七年过去了，这期间我写过吴文化分期的文章，也写过讨论吴越兵器的文章，我的兴趣不是越来越小，而是越来越大，因为我越来越认识到吴文化在中国考古学上的重要，吴文化对中华文化贡献之重要，今天我讲《考古学上的吴文化》，就算对大家的一个汇报。

一、古代典籍记载的吴国史

中国是史学大国，有丰富的历史典籍留存于世，在先秦文献《左传》、《国语》和汉代及以后的史书《史记》、《越绝书》、《吴越春秋》等书中对吴国历史都有记载。《史记》中有一篇叫《吴太伯世家》，说周人的先祖古公亶父的大儿子太伯、二儿子仲雍乃奔荆蛮，断发文身，自号勾吴。唐朝人张守节作《史记索引》解释说荆蛮之地就是越，这就是说吴也是属于越系的。吴国的首脑人物太伯、仲雍来自中原，本是用笄束发头戴帽子的，到了这里，披发文身，完全从了当地风俗，这就开始了一个漫长的民族融合的过程。

吴国国君据史籍记载有二十五个，有的是父子关系，有的是兄弟关系，记载的非常清楚，不会是

杜撰的。大家知道，《史记·殷本纪》中有不少商王的名字，有人觉得靠不住，但甲骨文发现以后，经王国维先生研究，除了一两个，全都对上了，因此《史记》中对比商朝晚好几百年的吴国世系的记载应该也是可信的，靠得住的。现在就把《史记·吴太伯世家》中的吴国世系列出来，请大家参照。



二、从以往考古发现看吴国历史与文化

从上世纪三十年代卫聚贤等人成立吴越史地研究会就开始了吴国史迹的探寻，但因条件限制，没有太大的突破。过去研究吴国史的学者都认为太伯、仲雍奔吴之地在今之无锡，1954 年在丹徒烟墩山一座土墩墓中出土了一件青铜簠，有长篇铭文，记载作器者矢受王命受民受疆土由虞侯改封为宜侯的事^[1]，著名古文字学家唐兰先生著文考证宜侯矢即《史记·吴太伯世家》中的周章^[2]，认为太伯、仲雍所奔之地即在丹徒所在的宁镇地区，从此围绕宜侯矢簠便掀起了吴国最早都城在何处的讨论热潮。赞成宜侯矢即周章的学者是多数，不同意的是少数。我虽

* 本文是作者 2010 年 6 月 12 日在苏州博物馆的演讲。

然也认为宜侯矢簋很重要,但我觉得这个结论还有讨论之处。首先,按照《史记·吴太伯世家》记载,周武王灭商后大封子弟和先王之后,得周章,周章“己君吴”,即是说周章是继承其父叔达为吴国国君的,并无再受王命由虞侯改封宜侯之事;再者,宜侯矢簋的时代有武王、康王、昭王三说,现在武王说已没有人提起,我主张的昭王说赞成者也不多,占优势的还是康王说。但即使是康王时期的,也与《史记·吴太伯世家》有关记载对不上号。我不同意宜侯矢即周章,但我却是太伯、仲雍奔吴之地不是在太湖之滨而是在宁镇地区的拥护者,因为从宁镇地区和太湖地区考古学文化互动关系的研究只能得出这个结论,而不能相反。我在有关文章中,曾专门作过论证^[3]。

考古界一般认为主要流行于太湖、杭州湾区的石室墓是越人的遗存,而主要见于宁镇地区的土墩墓与吴有关。从考古发现来看,在宁镇地区的丹徒谏壁至大港沿江一带,分布有西周至春秋的多座大型土墩墓,有的作过发掘,这些墓葬多位于山顶之上,皆出土有青铜器。据研究,其中有少量是中原铸造的,是典型的中原式,如丹徒烟墩山1号墓的宜侯矢簋、大港母子墩墓的伯簋等;大量的是当地仿中原样式的,如与宜侯矢簋同一墓葬出土的附耳簋、附耳圈足盘、鸟纹觥等,与伯簋同一墓葬出土的雷纹鼎、雷纹鬲、兽耳簋、勾连纹三段式尊、鸟盖卣、鸟盖壶等;另有少部分形制、花纹全是当地铸造、不见于中原式样的。如果大家有兴趣,就请看看2008年文物出版社出版的《镇江出土吴国青铜器》图录和2006年中国文史出版社出版的《镇江吴文化研究》论文集。为什么说这些西周至春秋的大墓是吴国高等级贵族墓葬呢?除了都是土墩墓这一点,最重要的是北山顶春秋大墓的发掘^[4],这座土墩墓中出土的兵器中有一件饰菱形暗花纹的青铜矛,上有2行9字铭文,据张敏和周晓陆两位先生考证,为吴王余昧自作器。由此证明这座春秋大墓应即吴王余昧之墓,时代、规模、铭文均与之相合。北山顶大墓不是孤零零的一座,像它一样规模的同样分

布在沿江山顶上的大墓还有不少,依例推想,其他大墓也应该是吴国王室的墓葬,其中也包括像烟墩山1号墓、母子墩墓、磨盘墩墓、荞麦山墓等西周时期的大墓。

太湖流域的无锡、苏州地区有规模很大的石室墓,有的也出青铜器,但主要是印纹硬陶器和仿铜礼乐器的原始瓷器,而且这类大墓时代都偏晚,见到的都是春秋晚期至战国,还没有一座是春秋中期以前的。这些墓究竟是吴墓还是越墓还有争论,即使有的确属吴国高等级贵族墓甚或包括王墓,但其时代也是晚的,这样看来,吴国势力由西向东发展的趋势和路线是很清楚的,太伯、仲雍奔吴首先到达的地区决不会是在太湖地区。

当然,以上谈的都是墓葬,而且只是其中的大墓,人们会说其他方面如何呢?前面我曾经说过,做出这个判断主要还是从两个地区考古学文化互动关系的研究,商至西周春秋,宁镇地区主要分布的是湖熟文化,湖熟文化的名字是南京博物院前院长曾昭燏先生给起的^[5],那是缘于在南京江宁湖熟镇一个遗址的发掘,当时她把与其类似的一类遗存命名为湖熟文化,后来大家都接受了。太湖杭州湾地区与湖熟文化基本同时或略早,主要是马桥文化,这是依据上海一个叫马桥的地方的遗址发掘命名的^[6]。马桥文化和湖熟文化是有一定联系但内涵有区别的两支不同的文化。从两者的互动关系来看,较早时期,商晚至春秋,湖熟文化是由西向东发展;春秋开始才看出马桥文化的后继者由东向西扩展,这种大的趋势和上面从两地区大墓的比较得出的结论是一致的。

那么,从考古发现来说,吴文化究竟有些什么特征呢?有学者已经对此作了很好的总结:首先,吴文化遗址多位于山脚下。南方水网密布,人们要防止水患,就要找靠山的高的地方住,如是在平地选址,甚至不惜人力堆成高台,所以平地上常见台形遗址。其次,流行土墩墓。贵族大墓多位于山顶之上,而且一墩一墓,多随葬青铜器,少见原始瓷仿铜礼乐器,有的有殉人,丹徒谏壁至大港沿江一

线的大墓都是如此。平民墓葬多位于半山腰，也有平地上的，一般一墩多墓，像前几年在句容发掘的第29号墩，里面竟有二十多个墓，这些墓多随葬印纹硬陶器和原始瓷器，少见青铜器。

还有一点我觉得很重要，吴文化墓中虽有原始瓷器，但主要是罐、钵、碗、盅等，少见或不见仿铜的编钟、勾、甬、铎等乐器，我认为这是区分吴、越文化很重要的一个方面。

三、苏锡常地区吴文化考古的新发现新期待

无锡是传说太伯、仲雍奔吴最早到达的地区，这里虽然没有可早到商代晚期能与吴联系起来的发现，但有一座叫阖闾城的城址却很早就被重视。以前大家知道的阖闾城由东、西二城构成，西城内有几座大台基，但城的面积不太大，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在复查时发现在城的外面还有一个城圈，根据采集的陶片，是春秋末期，因此推测这座有内外城的大型城址真有可能是春秋时期的，至于是否真是阖闾所建，那还要做很多工作。

苏州当然是吴文化考古的重点地区，说到苏州就不能不说苏州西边的木渎古城，1989年苏州博物馆考古部的钱公麟先生写了一篇文章^[7]，根据他对文献的考证和实地调查，现在的苏州城不是所谓的吴大城，因为有一段城墙居然压着汉墓，真正的吴大城可能是木渎古城。此说一出，立即引起争论，反对者多，赞同者少，但似乎都没有提出过硬的证据。2002年苏州博物馆考古部作了调查试掘，开了小型现场论证会，我也应邀参加了，大家一致认为时代没问题，确是春秋城址。1 记得当时他们告诉我，苏州的中心有可能向西转移，要往太湖边上发展。我一听就急了，这么一来，木渎古城不就全完了？苏州可是历史文化名城啊，木渎古城要是全被开发了，将来想找阖闾的吴大城，也没有地方了。我们与会的几位希望苏州同行能如实向上级反映，他们也的确反映了，苏州市的领导很重视大家的意见，没有把木渎镇附近这一块作为未来苏州核心区开发，尽管现在还有零星的破坏，但整体算是保护

下来了。这真是值得庆幸的事情！

尤其令人高兴的是，2009年在苏州博物馆考古部基础上独立成立了考古研究所。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与市考古研究所经过协商，组建了联合考古队，专门围绕苏州古城开展工作，在短短几个月的时间内，他们围绕木渎古城作了系统调查，对周围各时代的土墩作了统计，发现了石器制作作坊和瓦，解剖了北城墙，发掘了南城墙上可能是水门的遗迹。种种迹象表明，这决不是一处一般的聚落遗址。为了总结从去年到现在几个月工作的成果和对今后工作的部署，联合考古队刚刚开过评估会，并于上午召开了新闻发布会。如果大家听了广播就会知道，我们用的措词是很慎重的，我们说通过在以前基础上新的工作，已初步证明木渎古城是一座春秋末年具有都邑性质的城址。这不是随便说说，这是有根据的。第一，时代明确，城墙是春秋末年所建，局部最晚也是战国早期；第二，规模宏大，城墙周长6060多米，与已知的东周韩、赵、齐、鲁、燕等中原封国都城大小不相上下；第三，出现了高等级建筑材料的瓦，证明城内有宫殿一类的建筑。这难道不是重大突破吗？这难道不是探索苏州城市发展史重要的线索吗？但是，千里之行始于足下，要真正把木渎古城，也包括无锡阖闾城及其他的城弄清楚，后头还有许多工作要做：

1. 加强对古代文献记载的梳理和可信性研究。这是我们做断代工程时的经验，文献很多，如果不作梳理，眉毛、胡子一把抓，没有头绪，你说那个可靠那个不可靠，心中无数，如果作了很好的梳理和可信性研究，用起来就好选择，从而为从考古学上寻找吴文化提供有用的线索。

2. 加强对考古调查、发掘材料的整理和综合研究，首先建立起从西周至战国的考古学文化分期标尺，用以通过比对确定城址所属的期段和年代。

3. 通过对江苏、浙江、上海等地不同区域考古学文化的比较研究，总结出吴文化与越文化的特征及其异同，以此为标准确定城址的性质和国别。真山大墓是苏州发现的一座非常重要的墓葬，以前我

们都认为是吴,现在张敏提出有可能是越,究竟是吴还是越,有了这个标准,判断起来可能就容易些。

苏州对吴、越历史和文化的研究都很重要,过去考古工作者已做了大量工作,而且卓有成效,希

望以此次木渎古城考古取得的突破性成果为契机,继续做好考古调查发掘和保护工作,及时向领导汇报,及时向有关专家征求意见,及时将取得的成果公之于众,让成果共享,将苏州市的考古和文化遗产保护工作推向一个新的阶段。

注释:

- [1] 江苏省文管会:《江苏丹徒县烟墩山出土古代青铜器》,《文物参考资料》1955年第5期。
- [2] 唐兰:《宜侯矢簋考释》,《考古学报》1956年第2期。
- [3] 李伯谦:《吴文化及其渊源初探》,《考古与文物》1982年第3期。
- [4] 江苏省丹徒考古队:《江苏丹徒北山顶春秋墓发掘报告》,《东南文化》1988年第3、4期。
- [5] 曾昭燏、尹焕章:《试论湖熟文化》,《考古学报》1959年第4期。
- [6] 上海市文物管理委员会:《上海马桥遗址第一、二次发掘》,《考古学报》1978年第1期。
- [7] 钱公麟: a 《春秋时期吴大城位置新考》,《东南文化》1989年第4、5期合刊; b 《春秋时代吴大城位置再考》,《东南文化》2006年第5期。

苏州史前文化概述

丁金龙（苏州市考古研究所）

苏州位于长江三角洲太湖平原东部，为湖积平原。境内地势平坦，湖荡棋布，河流纵横。长江流经北缘，太湖位于西隅。优越的地理环境，为人类生存提供了条件。苏州境内经考古调查发现新石器时代遗址有数百处。可分为环太湖区、苏南沿江两个文化区。自上世纪 70 年代以来，通过对吴县草鞋山、张陵山，昆山赵陵山、绰墩山、少卿山，常熟罗墩，吴江梅堰袁家埭、龙南、广福村，张家港东山村、徐家湾等遗址的发掘，确立了马家浜文化→崧泽文化→良渚文化，史前文化的发展序列。

马家浜文化，主要类型有东山村和草鞋山。东山村类型以张家港东山村遗址为典型，属苏南沿江文化区。草鞋山类型，苏州境内主要有吴县草鞋山、苏州越城、昆山绰墩山等遗址，地处太湖流域腹地。马家浜文化实行氏族公共墓地，流行俯身葬。文化特点：以腰沿圈底釜、牛鼻耳罐、三足平底鬲、红衣或外红内黑的喇叭形圈座豆等器形为代表。

崧泽文化，主要以张家港徐家湾类型为代表。崧泽类型有吴县草鞋山、吴江同里、昆山绰墩等遗址。其文化特征明显，陶器种类多，马家浜时期主要流行器形釜，到了崧泽文化时期逐渐被鼎所取代；罐、壶等器形以折肩、折腹为特征以及豆把上出现折阶；盛行矮圈足器；刻划纹与镂空组合纹饰丰富多彩以及彩绘的出现。崧泽文化虽然像马家浜文化一样，仍流行氏族公共墓地，然而，氏族成员之间已出现分化，初级王权已经产生。

良渚文化，主要以吴江梅堰龙南类型为代表。该遗址所揭示的以河道为中轴，居住址分布在两岸的聚落形态，是苏州最早的水乡村落。这一时期的遗址苏州境内还有苏州越城、独墅湖，吴县草鞋山、

张陵山、澄湖，常熟罗墩、黄土山，昆山赵陵、少卿山、绰墩山等。良渚时期盛行土筑的高台墓地，埋葬一些氏族首领、贵族，并以随葬玉琮、玉璧为特征的墓葬。其中，草鞋山遗址首次在国内墓葬出土玉琮、玉璧，解决了史学界长期争论不休的琮、璧年代问题，在考古上具有划时代意义。

赵陵山遗址在埋葬大墓的高台外围发现 19 座墓，其墓主尸骨被砍掉下肢、双脚，或身首异处。如此大规模的附葬现象在良渚文化中尚属首次发现。

一、草鞋山遗址

草鞋山遗址为江苏省文物保护单位，位于苏州城东 15 公里处的唯亭镇陵南村阳澄湖南岸。该遗址 1956 年发现，1972 年至 1973 年进行了两次发掘；1992 年至 1995 年进行四次发掘；2008 年，配合京沪高速铁路建设又一次发掘；2009 年，配合草鞋山遗址保护规划，在对遗址进行考古勘探调查的同时，配合园区夷陵河驳岸工程对遗址再次进行发掘。通过上述工作，确定了遗址的范围即从原来省保单位 44000 平方米，扩大到现在 221000 平方米。更主要的是对遗址文化内涵的进一步认识，可以概括如下：

1. 草鞋山遗址是 20 世纪 70 年代太湖地区重要的考古新发现，其年代约距今 6500—4200 年。在太湖地区新石器时代遗址中，地层堆积最为丰富、时间跨度最为完整，并通过发掘首次建立了由马家浜文化→崧泽文化→良渚文化，太湖地区史前文化的发展的先后关系；
2. 草鞋山遗址良渚大墓出土的玉琮、玉璧，不仅解决了琮、璧年代问题，另外首次确立了琮、璧、钺类玉礼器是新石器时代礼器的观点；
3. 遗址揭示出 6000 年左右马家浜文化时期水稻田与水

井(蓄水坑)、水塘、水路等相配套的灌溉系统,为长江下游稻作农业与栽培稻的起源研究具有重要意义^{[1][2][3][4]}。

二、绰墩山遗址

绰墩遗址位于江苏省昆山市正仪镇北绰墩山村。该遗址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总面积约40万平方米,其中心区四周环河,面积约25万平方米左右,余为遗址的边缘区,面积约15万平方米左右。

自1998—2004年,通过六次,连续七年发掘,共计发掘面积3393平方米,清理发现各类遗迹430多处。其中,比较重要的是揭示出距今5000—6000年左右的新石器时代居住址14处,以及相关的河道、灰坑、墓葬与水田遗迹等^[5],较全面地反映了新石器时代马家浜文化至良渚文化时期的聚落形态与布局,特别是发现了6000年左右,马家浜时期的64块水稻田以及相关的蓄水坑、水沟、水口等农田灌溉系统,为长江下游稻作农业与栽培稻起源提供了重要依据。

绰墩山遗址发掘过程中,坚持与多学科方面进行合作,并已取得了较好的成果。先后邀请南京师范大学地理科学学院作孢粉、硅酸体分析^[6];江苏省农业科学院进行植物蛋白石分析以及对出土的炭化米粒作鉴定^[7];南京博物院进行墓葬人骨鉴定^[8]及对出土木材加固处理;南京林业大学进行出土木材测试与鉴定;江苏省地震研究院采用精密磁测技术,探测绰墩遗址中心区域古河道、古水田遗迹的走向与分布;北京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北京大学文博学院碳十四实验室做C14年代测定等。特别是第六次发掘,与中科院南京土壤研究所合作,对马家浜文化水田遗迹,从生物、化学、物理等角度,分别进行了孢粉、磁化力、肥力、有机质以及氮、钙、镁、钾、钠、磷等成分分析,从水稻田的形态特征、结构以及结合分析结果^[9],研究水稻田所处时代的环境质量、条件、土壤结构、保肥能力及其变化等方面研究,取得了可喜的成果。多学科合作所测试(鉴定)与研究结果,为我们认识绰墩

遗址不同时期的文化内涵提供了科学依据。

三、东山村遗址

遗址位于张家港市西约18公里的金港镇东山村,北距长江约2公里,西临香山,遗址即坐落在香山东脊上。经调查勘探,遗址南北、东西各长约500米。1989年至1990年,两次小规模发掘中,发现新石器时代居住址6座,墓葬8座。之后,2008年、2009年进行两次较大规模的发掘^[10],除发现11座马家浜文化墓葬外,主要是揭露出一处崧泽文化时期的聚落。在聚落中心分布有房屋基址5座,东部为小型墓葬区,迄今已发现早、中晚期墓葬27座,墓葬长2.2米、宽0.8米左右,随葬品一般10件以上,多的一墓达26件,少的有2至3件。西部主要是大型墓葬区,已发现10座,有早期的,也有中期的,墓坑长度多在3米左右,宽度多在1.6米左右,随葬品数量多在30件以上,其中玉器多在10件以上。编号M90随葬器物达56件,有大型石钺5件,大型石钺1件,镯、璜、玦、管、耳璫、饰件等玉器19件,鼎、豆、罐、鬲、壶、盘、缸等陶器26件,是迄今所知崧泽文化墓葬中随葬数量最多的一座。崧泽文化大墓的发现证明,长江下游地区较其他地区为早,在距今五千七、八百年以前,社会已经存在明显分化,到了初级王权产生阶段。

四、广福村遗址

广福村遗址位于吴江市西南58公里处的桃源镇广福村,地处江苏省最南部。1996年12月,在遗址的西南部发掘160平方米,清理出一批马家浜文化墓葬、房址以及马桥文化水井、灰坑等。马家浜文化墓葬共有20座,其中有18座集中在100平方米范围内。墓葬以俯身直肢葬为主,少数为仰身直肢,头均向北。随葬品主要是陶器,多置于骨架下,十分少见。器物不多,类别有豆、盆、鼎、杯等。有些陶器还是有意打碎后再放入墓内的。此外,个别墓随葬石斧、纺轮、玉玦,有的还随葬猪

獠牙、鹿角等^[11]。

五、龙南遗址

龙南遗址位于吴江市梅堰镇龙南村,该遗址从1987至1997年,十年期间先后进行了四次发掘^{[12][13]},合计发掘面积1200平方米。揭示出良渚文化时期以河道为中心、河道两岸分布居住址的村落。发现良渚文化居住址14座,建筑形式有半地穴式,也有平地起筑,还有干栏式建筑。另外,有17座墓葬分布在居住址附近,且二、三座墓葬为一组,反映出以家庭为特点的埋葬习俗。河道为中轴,两岸分布居住址以及灰坑、水井、墓葬等组成的良渚文化村落,以及房址与祭祀坑;墓葬与祭祀坑等,为研究良渚文化时期的社会形态江南村落提供了较完整的资料。

六、赵陵山遗址

遗址位于昆山市张浦镇赵陵村,为江苏省文物保护单位,属太湖流域典型的土墩遗址。地方志上古人对该遗址的描述为“……以山名而无石,意前代积土而成。凸起平壤,隆若丘阜,四望皆水环之。”遗址的特点与环境表述十分清楚。

该遗址的分布面积达16万平方米,中心面积1万平方米。在经1990、1991、1995年3次考古发掘,合计发掘面积2000平方米^[14],遗址文化堆积厚达9米。上层为春秋时代遗存,中层为良渚文化,下层为崧泽文化。该遗址是一处良渚文化人工堆筑的高台墓地,共有92座墓葬,特别是发现多座高等级良渚早期大型墓葬。出土文物600余件,其中玉器200余件,石器130余件,陶器270余件。其中编号为M77号的大墓,为良渚早期墓葬,不仅其葬具有彩绘痕迹,而且出土了丰富的随葬器物,除了陶器、石器外,仅玉器就达125件(套)之多。在墓主腰部右侧放置的大石钺,其孔内的神人鸟兽透雕玉饰,这种由人、兽、鸟构成的图案,不少专家认为,是人、兽、鸟合一,即天神、地祇、祖先三位一体,是先民天人合一观念的体现。

体现了随葬器物的墓主在当时极有政治和经济地位。

引人注目的是,在高土台的外围西北部发现一批附葬墓葬,其中一些墓主尸骨被砍掉下肢、双脚,或身首异处。如此大规模的附葬现象在良渚文化中尚属首次发现。

赵陵遗址的重要发现对研究良渚时期的社会现象,探索中国文明起源提供了新的重要资料。

七、少卿山遗址

遗址位于昆山市千灯镇东北,原有面积大约4万平方米。现存少卿山为一东西长40、南北宽20、海拔高程12.7米的椭圆形土墩,土墩高出地面约7.7米。

该遗址1958年发现,1977年,在土墩内出土穿孔石斧、有段石钺和双孔石刀等遗物。1984年,修筑少卿公路,在土山的南侧发现琮、瑗、钺、镯等玉器一组19件。1984、1997年,先后两次合计发掘220平方米。通过发掘,确认少卿山遗址是一处含崧泽文化和良渚文化等遗存的新石器时代遗址。其中,在早期良渚文化堆积之上堆筑有一面积约1600平方米、高6米的土台。上埋葬出土琮、瑗、钺、镯等玉器19件的大墓。在土台上还发现有瘞埋玉璧、玉珠以及动物骨架和人头的祭祀坑^[15]。

在少卿山(墩)北部发现良渚文化早期村落,发现居住址1座,保存有墙二段。墙体结构为:用两根芦苇并排为经线,五根芦苇并排为纬线,经纬交叉编织,其内外再抹上泥,形成厚度大约15—20厘米的土墙,土墙还有用30多根条木组成的木制门窗等。

少卿山遗址发现的良渚文化土台,既是用作墓地,又是祭台;良渚文化早期村落中发现的房址等,为我们研究当时的社会形态与建筑结构等提供了实物资料。

八、罗墩遗址

遗址位于常熟市练塘镇罗墩村,东北距市区约7

公里。1992年,村民在罗墩取土时发现良渚文化玉镯、玉珠和石钺等文物,经调查发现发掘罗墩遗址为一处良渚文化高台墓地,高出地面约4米,顶部残存面积约200平方米。

1993、1994年先后进行两次发掘,对残存的200平方米的土台进行了抢救性发掘,清理良渚文化墓葬14座,共出土器物250件,其中玉器116件,石器29件,陶器105件。玉器种类有璧、镯、环、瑗、管、戒、珠、坠、冠饰,双龙环形饰等10余种。石器有穿孔石斧、斨等。陶器有贯耳壶、鼎、罐、盘、匚、杯等。玉器中玉雕双龙环形饰是太湖流域良渚墓葬中首次发现^[16]。

九、维新遗址

维新遗址位于太仓市北双凤镇南204国道西300米左右。海拔高3.9—6米,地处距今六千年前形成的冈身之上。经考古勘探调查,遗址四周环水,分布范围为6万多平方米。

2003年,在抢救性发掘中,除发现马桥文化遗物外,重要的是发现良渚文化土台以及土台下多层良渚文化堆积与出土遗物。发掘材料证明:维新遗址是一处从良渚文化到马桥文化的早期文化遗址。这一发现使太仓人文历史从原来的2000多年推进到了4000多年以前^[17]。

注释:

- [1] 南京博物院:《苏州草鞋山良渚墓葬》,载《东方文明之光——良渚文化发现60周年纪念文集》,海南国际新闻出版中心1996年,第1—17页。
- [2] 丁金龙:《长江下游新石器时代水稻田与稻作农业起源》,《东南文化》2004年第2期。
- [3] 南京博物院:《江苏吴县草鞋山遗址》,《文物资料丛刊》第3辑,文物出版社1980年。
- [4] 邹厚本、谷建祥等:《江苏草鞋山马家浜文化水田的发现》,见《稻作陶器和都市的起源》,文物出版社2000年。
- [5] 苏州博物馆、昆山市文物管理所等:《江苏昆山绰墩遗址第一至第五次发掘简报》,《东南文化》2003年增刊。
- [6] 萧家仪、丁金龙、郭平等:《绰墩遗址古植物群、古环境与人类活动》,《东南文化》2003年增刊。
- [7] 汤陵华:《绰墩遗址的原始稻作遗存》,《东南文化》2003年增刊。
- [8] 李民昌:《绰墩遗址新石器时代墓葬人骨鉴定报告》,《东南文化》2003年增刊。
- [9] 丁金龙等:《中国古水稻土研究现状与展望》,中德学术研讨会2004年10月10—15日。
- [10] 南京博物院、张家港市文广局、张家港博物馆:《江苏张家港市东山村新石器时代遗址》,《考古》2010年第8期。
- [11] 苏州博物馆、吴江县文物管理委员会:《江苏吴江广福村遗址发掘简报》,《文物》2001年第3期。
- [12] 苏州博物馆、吴江县文物管理委员会:《江苏吴江龙南新石器时代村落遗址第一、二次发掘简报》,《文物》1990年第7期。
- [13] 苏州博物馆、吴江市文物管理委员会:《江苏吴江龙南新石器时代村落遗址第三、四次发掘简报》,《东南文化》1999年第3期。
- [14] 江苏省赵陵考古队:《江苏昆山赵陵遗址第一、二次发掘简报》,《东方文明之光——良渚文化发现60周年纪念文集》,海南国际新闻出版中心1996年,第18—37页。
- [15] 苏州博物馆、昆山市文化局等:《江苏昆山少卿山遗址的发掘》,《考古》2000年第4期。
- [16] 苏州博物馆、常熟博物馆:《江苏常熟罗墩遗址发掘简报》,《文物》1999年第7期。
- [17] 闻惠芬、张铁军、朱巍等:《太仓市维新遗址试掘简报》,《苏州文物考古新发现——苏州考古发掘办稿专辑》,古吴轩出版社2007年,第285—299页。

农业起源与新旧石器时代的过渡性特征

——论环境失调是农业起源的根本动力

刘宝山（无锡市文化遗产保护和考古研究所）

一、关于农业起源的理论问题

有关农业起源的地区问题理论众多，其中包括有两种针锋相对的说法：一种说法认为，农业起源于富裕的食物采集文化地区^[1]；第二种说法认为是起源于较贫困的地区^[2]。从自然地理方面考察农业的起源地，最初依据在两河流域的考古发现，曾经比较流行地认为农业起源于“低平地区”或者称之为“沼泽农业”，这就是所谓的“大河理论”，另外还有“干燥理论”、“气候高潮理论”、“人口压力论”、“文化自然进化论”、“绿洲论”、“沃野边缘山地论”、“天然居住带交叉点论”等等^[3]。其他还有人提出“中纬度理论”，断定农业起源于中纬度地区，其他地区的农业，是在地球中纬度地区农业产生后，逐渐传播而产生的^[4]。甚至有人抛出“农神说”^[5]，认为中国黄河流域是最早的起源地和独一无二的发展中心，中华祖先中的英雄神农氏、后稷是农业的开创者，各种农作物全是由他们培育成功并传播开来。当然相反的就有人提出农业起源多元论，理由是人类的心智、认识是相同的。由于人性一致的原则，因此具有同一的智力原理，同一的物质形式。所以，在相同文化状况中的人类经验的成果，在一切的时代与地域中都是基本相同的^[6]。农业的发明是人类集体智慧的结晶，不可能由某一个人发明的^[7]。

针对于我国境内，也有农业起源地域上的争论，有黄河中游说、黄河下游说、淮河下游—长江中游说、长江下游说、华南说、云贵高原说、西辽河流域说以及多元说等等^[8]。

其实农业起源是多种综合因素作用的结果，多种因素的相互作用导致了地区性的“环境失调”，从

而演变成为农业起源的真正动力，任何单一的理论都难自圆其说。因此，随着考古资料的不断增加和研究的不断深入，“平原论”的观点被推翻，原始农业起源于山地的观点逐渐兴起^[9]。现在，又有学者认为森林和草甸的接界地带是农业起源的最初地带，这种观点一直延续到今天仍有市场。另外又有人提出“洞穴论”^[10]，指出，人们由于长期在一个洞穴内居住，他们可以更好地观察洞穴外植物随季节而发生的变化，然而在洞穴周围长期活动，使得食物的来源成了问题，所以人们依据长期观察所获得的植物生长的经验，有意在附近去栽培某些适合人类食用的植物，这样农业便产生了。也有学者认识到，农作物的种植与自然环境有关，而与考古学文化传统关系不大。也就是说同一地理环境下，不同文化类型的农作物种植具有相似性，同一文化类型遗存由于所处的地理位置和自然条件不同，其农作物的种植就并非相同^[11]。但是，很快就有人认识到，以环境因素来解释农业的起源就像“把工业革命的起源归因于靠近海洋河道一样。”环境所提供的是一个文化系统变化的初始条件，它不能解释在相同条件下文化系统发展的差异性。另外，人口压力论也可以归结为一种变相的客观环境论，比如宾福德计算出每当100平方公里人口超过1.58人的时候依赖狩猎生存就不可能了，而当人口密度超过9.098人时，植物采集经济也难以继了。这时候采集狩猎的人群可以分为所谓的“集食者”（储备食物、居住地址固定）和“寻食者”（居住不固定、不储备食物）两类，其中生活在温带地区的集食者最终有机会发明了农业^[12]。但是这种论点在外面绕了一大圈，

最终仍然不过是环境决定论的翻版而已。

总之,笔者认为农业的起源问题不能一概而论。试想,如果说无论粟作农业还是稻作农业都发生在自然条件好的富裕地区,那么仅靠狩猎和采集就足以丰衣足食的人们还会辛苦地砍伐森林开荒耕作吗?何况原始社会由于工具的落后、耕种比现在更加辛苦而产量更为低下。另外,属于禾本科的草类在森林茂密的树荫下在自然竞争中根本沾不到便宜。反过来,如果无论粟作农业还是稻作农业都起源于贫瘠的土地,那么,需要高温和大量雨水的稻作农业如何得以必然发生呢?还有所谓“洞穴定居”可以观察植物生长规律的说法也是站不住脚的。了解植物生长的规律和定居并没有必然的联系,动物世界里大量的食草动物不定居也能了解植物的四季生长规律而逐水草迁徙。简单的栽培并不需要一定在自己居住的洞穴附近,暂时居住几个月的临时住所就可以栽培蔬菜等植物,只有发展到耕作农业阶段或者至少发展到“刀耕火种”阶段才可以说和长期定居发生必然的联系。任何一个地区的起源农业都有适合本地区的特定物种,所以探讨农业起源的本质实际上要探讨的是某一特定地区特定农作物的起源问题。如果在美洲就是探讨玉蜀黍(玉米)的起源,在西亚和欧洲就是探讨小麦和大麦的原始农业起源问题,具体到我国北方地区特别是黄河流域,要探讨的就是粟作农业的起源问题,这是由于北方的气候特点和考古发掘的实物资料决定的。归结起来,世界农业存在六大作物的三大起源中心:大麦、小麦的起源中心,主要在地中海周边地带,首先是两河流域以北的山前台地、高原的新月地带,然后传播到两河流域与尼罗河谷;稻米、粟的起源中心,主要在东亚大陆的中国,其中稻作农业主要起源于华南广西、长江中下游,粟作农业主要起源于太行山脉与华北平原交界的山前河边台地,而后才逐渐扩展到黄河流域;玉米、马铃薯的起源中心,主要在西半球新大陆的中南美洲,其中玉米起源可能在1万年前的中美洲墨西哥一带,而马铃薯最早起源在1万年前安第斯山脉的南美洲秘鲁的安卡什省沿海高

原峡谷地带^[13]。

另外,某种农作物的起源之前,存在一个人类对植物生长规律的认识过程,最早栽培的可能是块茎植物。由于块茎植物产量大容易种植,栽培块茎植物是应付“环境失调”时期恶劣环境的有效方式。民族学资料和传说资料认为“原始农业发生之初,首先栽培块根作物”^[14]的问题,现在甚至已经有学者提出,我国除了以种植稻谷为代表的稻作农业起源和以种植粟和黍两种小米为代表的北方旱作农业起源之外,还存在着一个以种植块茎类农作物为特点的华南地区原始农业的起源^[15]!然而块根食物的田野考古遗存是不容易发现的,笔者认为只能以后依靠考古科技的发展去寻找块茎食物的蛛丝马迹。

二、农业起源与新、旧石器时代之交的过渡性特征

据地质学研究距今2.2至1.5万年期间我国的平均气温比现在低10℃,东北地区植被为苔原,华北、华中、华东多为草原,芜湖一带森林为草原所代替,相当于今山西北部植被。末次冰期之后的地球上出现了三大古文明区:西亚的麦类作物农业文化和中美的玉米类作物农业文化,然后就是我国的黄河流域的粟类农业文化和长江流域及东南沿海的稻作文化区。

在我国,有人提出旧石器时代晚期到前仰韶文化之间的过渡性发展机制问题,认为这一阶段的农业文化存在断层,并试图从气候变化方面去找原因,认为与末次冰期之后经历的巨大大气气候变化有关^[16]。也有文章认为在采集生活向农耕生活迈进的过程中,物质的匮乏使得原始人们进入到观念农业阶段^[17]。笔者认为,从更新世末到全新世初,确实显示有人类从利用大型食草动物向小型动物和其他资源转变的趋势,表明冰后期气候变化对生态的影响。在一些地区造成植被更替,动物群消失,这种情况其实就是“环境失调”,环境失调是新、旧石器时代之交过渡性的典型特征!

从考古学上来看,由于许多农业起源地的发生